

做爱做的事，好玩的人

□戴来

写短篇始终能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成就感，尽管有时过程中也会有类似于便秘的痛苦，但当终于完成，终于可以从坐久了的那个地方站起来，这时所获得的满足绝对大于从便秘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尤其是当写着写着，故事的走向完全脱离了我最初的想法，擅自奔跑了起来，我跟在它后面，气喘吁吁，然后我又超过了它，看到了更多可选择的方向和奔跑的可能性。我时不时回头瞟它一眼，或者故意停下来让它跑到我的前头，它跑啊跑，我也跑啊跑。我们交替领跑，这里面有斗智斗勇的游戏的快乐。

比较而言，写中长篇就是一件体力活儿，需要作者长时间保持充沛的体力和饱满的叙事热情。我书桌前的那张椅子差不多是我使用得最多的一件家具，我坐在上面，可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写东西。我每天的生活都会从找借口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直到实在不好意思玩了才打开文档。而当我玩的时候，我很清楚文档里有个相濡以沫了很久的家伙在等着我，看我如何编排接下去的情节，看自己的命运如何在我笔下起承转合。

很多时候，写作的乐趣和痛苦都来自于自己较劲。然而长时间地坐在那儿，实在是一件比较枯燥的事情。要是这个时候，刚好接到我父亲的电话，我会感到绝望，因为他老人家的电话如果不是第一句就问，你是不是在写作？那么最后一句肯定会说，不要浪费时间，好好写作。他就像是一个时刻关心着地里收成的地主，看不得我懈怠偷懒。尽管他不和我住在一起，但我总觉得下一秒钟他就会敲门闯进来，就像多年前他经常做的那样，而每当这时候，我总是在干着一件和学习无关的什么事。

我装模作样地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书，心里盘算着明天放学后找个什么由头去看场电影，或者干点有趣的事。这样的场

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最后无一例外地被我父亲的怒喝声打断：你在干什么？

平时我跟外界联系不多，这和性格有关，也有能力的问题。我总是对自己说，属于你的早晚都会属于你，不属于你的就算暂时属于了你也终有一天会离你而去。所以属于自己的东西即使有一天离开了我，我会因为不曾为此做过努力而安慰自己：现在看来，这本就不属于你。

时至今日，我依然会因为新鲜的有趣的玩意儿而毫不犹豫地把正进行中的写作搁一边，依然没有改掉当学生时历任班主任评语中的缺点，自由散漫，依然坚持写我想写的，做爱做的事，好玩的人，依然认为天大的事，抵不过自己喜欢。

看样子我要把这写成一篇检讨书，那么我再加上一条，我还是个懒散的人，很少参加剧烈运动。最剧烈的一次是从苏州跑到了河南，这之后我喘了好几年，才算调整好了呼吸。后来在北京以学习的名义时断时续地待过一年半载，现在想想都觉得累。

其实日复一日的庸常的不动声色的生活特别适合我。似乎这样的生活能把时间拉长，在机械而单调的线形的生活中，欢乐和痛苦都变得迟钝模糊，有难度和强度的运动就放到文字里去完成吧。我喜欢过轻车熟路的生活，不用与陌生人、陌生的生活程序打交道，太多的生活上的改变会让我不安。我时常会有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的感觉，这是我的生活，但跟我关系不大。我尊重这种感受，同时也知道这是有问题的。

我知道这又是一篇谈了跟没谈一样的创作谈，因为创作本身实在没什么好谈的。对于写作者来说，他已经在写的过程中尽力呈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余下的是读者和评论者的事了。



戴来，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曾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2002年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代表作有《茄子》《准备好了吗》《亮了一下》《向黄昏》等。

想象有意思的故事——戴来小说论

戴来的重点

□金仁顺

想来想去，戴来没有重点。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她的重点是，老是抓不住重点。

戴来写作最旺盛的创作期，是在她怀孕以及带小宝宝的那几年。通常女人们在这个阶段，会完全放弃外部世界，沉浸在日常事务中，抓狂和抑郁变成情绪主调；戴来显然不是个通常的人，她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奶瓶尿布中间游刃有余，把日常生活烹制得有滋有味儿，调理得井井有条，还能行云流水般地写小说，长短篇，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文袖一时间舞得风生水起，让文坛前辈后辈都对她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进而初中高中，戴来有了大把时间，却没有花在电脑上大展鸿图，勾画她的文学世界；她把双手揣进兜里，闲似庭前老树，淡成天上云朵，不疾不徐，不愠不喜。这期间她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和上海作协的作家高研班，高研的结果是，写得越来越少了。

没重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没野心。戴来的写作任性随意，小说题目通常起得稀里哗啦，《亮了一下》《甲乙丙丁》《对面有人》《给我手纸》，别人嫌弃呢，她自己还就不耐烦了，要起性子来，《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门，我不在》《把门关上》，虽然不耐烦，但她也知道，写作无论怎么样，已经是一种宿命，所以，《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得《将日子折腾到底》，还得《练习生活练习爱》。

作家戴来最让人赞赏的部分，是她有本事把日常生活中的汤汤水水料理得妥妥帖帖，在一般女作家们孤芳自赏、支离破碎的生存层面里，戴来是华丽丽的，自由的，筋筋道道的，她对日常生活的融入是彻底的，不留后路的；她沉浸，却形散而神不散。她的随和闲适中间，有骨有刺，轮廓分明，毕竟，她不只是戴来，她是作家戴来。戴来扯生活中的纠结、失望、无奈，以及爱情、温情、亲情放进了小说里面，编织着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或者情短的故事，她的小说很少关乎自己的痛痒，她没有诉说自己不幸的习惯；她倒是总有份温存的心思替别人担忧，在她落笔之处，那些细微的起伏，那些波澜壮阔的心思，都是为人代言。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强调这种疏离，她摈弃



□张俊平

号入座地认为他精神出轨，在无休止的无谓的争吵中，他们原本就不稳固的婚姻生活岌岌可危。身患绝症的男子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对妻子的感情变得犹疑不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生活中的不幸福者，亲情、爱情甚至经不起微不足道的生活琐屑的考验，更遑论挫折与不幸的打击了。小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失落感和虚无感，这是戴来小说常有的气息。

爱情和婚姻问题是戴来在小说中经常探讨的话题，对于此，戴来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即爱情是有保质期的，婚姻是需要妥协的。在戴来的小说中，我们既看不到甜蜜的爱情，也看不到稳定持久的婚姻，有的只是猜忌、妥协、将就和纯粹对欲望的渴求。

总的来看，戴来笔下的人物是边缘人，也是失败者，他们有反抗平凡命运的念头，却往往像火星一样一闪即逝。生活中的挫折磨平了他们的棱角，在与生活的对阵中他们节节败退，最终成为命运的俘虏，在被强加的境遇中苟且偷生。对这类人生境况和心理状态的审视和观照成为戴来意义发掘的渊薮，也是小说写作的价值所在。戴来坦陈：“在我看来，生活经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在把握着生活，其实生活一直在掌控着你，面对我们无从把握的生活，我们只能不断地‘练习’生活，修炼自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戴来的眼中，生活具有悲观主义的底色，人类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呈现出迷惘的精神面貌和灰色的内心世界正是戴来认为“有意思”的地方，而戴来通过小说所传达的理性的怅惘和悲悯的情绪也是戴来追求的意蕴所在。

在小说中，戴来喜欢“用‘轻’的形式来表现‘重’的东西”，这种“轻”的形式具有多重内涵。戴来小说的语言一向是冷静的、懒散的，带有不紧不慢的调侃的意味，情节越是夸张到极致，她的语言越是冷静得不可思议，有时甚至是残忍的，就像是在讲述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而且从中感到快意。戴来的小说经常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在让人猝不及防的时候，把主人公无情地置于极端尴尬的地位。《亮了一下》中的夫妻俩貌合神离地生活在一起，其实都是婚姻爱情的背叛者。丈夫在一次偷情回来的时候正好撞上了正在安排和情人幽会的妻子。《我看到了什么》中的安天在一次精神出轨后，回家看到了妻子与别人在床上偷欢的情景。小说在戏剧性的转折之后戛然而止，形成富有高潮意味的结局，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带给读者饱含悲剧性的幽默感受，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戴来的小说在标题的设计上也颇有新意，小说都是在写好之后选取小说中某人说过的一句有意思的话或者一个词作为标题，这种看似轻松随意的做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状态，在小说的标题和内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言说空间，许多小说的标题因此产生了超越文本意义的意味，使得戴来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寓言式的色彩。